



反思：对《语文课程标准》批判教学设计

Reflection on the cr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编订：JinTai College



反思：对《语文课程标准》批判教学设计

前言：小泰温馨提醒，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点教学科目，其教学的内容是语言文化，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语言文化。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基础，也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等的工具。本教案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并以启迪发展学生智力为根本目的。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修改调整及打印。

江西临川一中 谢水泉

前言 从小老师就教育我，对于前人的理论，既要敢于坚持对的，又要敢于批判错的，哪怕是大多数人拥护的权威的理论。

《语文课程标准》如果是对的，批判只会使它更显科学的光彩；如果是错的，批判将会使它迅速走向科学。为了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和亿万青少年的迅速成长，笔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希望网友们不要把此文看成仅仅是对《语文课程标准》的批判，而应把它看成是对一百年来占主流地位的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竭诚欢迎网友们反批判。

语文课程标准是指导语文教学实践的纲领性、法规性文件，是语文教学实践必须遵循的准则。它的科学与否，关系到我们的

子孙后代能否快速高效地熟练掌握母语，进而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否迅速提高。

笔者觉得近年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同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基本一样，仍然是很不科学的，用它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可能使亿万青少年迅速高效地熟练掌握母语。因此必须尽快进行重大修订，甚至要推倒重来。

—

语文课程只是基础教育中众多课程之一，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实现基础教育的总体目标。基础教育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各门课程专心致志卓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有一门或几门课程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热衷于搞种种“第二职业”，总喜欢“在自己的田里种别人的庄稼”，那么基础教育的总体目标就不能圆满完成，甚至还有落空的危险。因此，确认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必须先将语文和非语文区别开来，进而必须能将语文课程同非语文课程区别开来。

可是新课标却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断是自相矛盾的，它根本不能把语文和非语文区别开来。交际工具是用来交流思想文化的，语文既然是交际工具，那么它怎么又会是被交流的文化呢？如果文化也是交际工具，那么什么是用文化这个交际工具交流的东西呢？语文又何以能成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呢？语文如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究竟是人类文化的哪一部分？它同其他课程中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堂堂新课标中居然会有这样的逻辑错误和含混透顶的核心概念，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新课标接着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论断，它根本不能把语文课程同非语文课程区别开来。我百思不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好妄加揣测：大概就是“交际工具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吧。可是前面它已说过：“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那么，“交际工具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就等于说“人类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了。这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难道人类文化与人文精神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要用语文课程来统一

吗？换一个角度来看，说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等于说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非工具性的统一”或“人文性与非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如同说“牲畜是动物性与非动物性的统一”、“庄稼是植物性与非植物性的统一”一样叫人莫名其妙、哭笑不得。什么叫基本特点？基本特点就是某个事物独有的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可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独有的区别于非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吗？许多非语文课程不也可以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吗？

笔者认为，把语文界定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并不算错。但作为严肃的科学的课程标准的核心理念，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蹩脚的比喻性的解释，而必须进一步说明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究竟是什么，并要把它同在哲学层面上与思想、观念、意识、精神、经验、知识等概念相同的非交际工具的“文化”区别开来。

首先可以肯定，语文教学就是母语教学，语文课程就是教学生学好我们的母语或者说国语即汉语的课程，因此，语文就是我们的母语或者说国语即汉语。那么汉语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汉语就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中的语词文字，而不是话语文章。因为话

语文章是外显的思想观念或者说文化知识，除了话语文章之外，世界上再也不存在外显的用人类语言构成的思想文化知识。当然，语词文字也是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同通常意义上的在哲学层面跟思想、观念、意识、精神、经验、知识等是同一概念的文化即话语文章具有本质的区别：

(1) 前者是全民族每个成员可以终生反复使用的用来交流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常用符号和最重要的工具，后者则不是；

(2) 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

(3) 前者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后者的形式则是由内容决定的。如果把语文即汉语混同于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那就必然要自相矛盾：语文既是交际工具，又是非交际工具；语文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语文既是基础的基础，又不是基础的基础；语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既是约定俗成的，又是非约定俗成的。由此可见，对语文的科学解释应该是：语文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中（不是脱离话语文章孤立存在）的语词文字，是交流思想文化知识的常用符号和最重要的工具。

这个解释如果要称之为工具论也未尝不可，但最好应称之为“新工具论”。因为它不同于以往的跟“人文论”看似对立实为一家人却又被“人文论”打得躲躲闪闪的“旧工具论”或者说“伪工具论”，它是“人文论”打不倒的。

就像一门学问的基本特点或者说本质属性，只能决定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一样，一门课程的基本特点或者说本质属性，只能决定于这门课程要教会学生熟练掌握的对象。那么语文课程要教会学生熟练掌握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一个假设。如果学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祖国的语词文字，即不再需要教学生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那么语文课程就可以取消。因为文化底蕴、知识素养、学问识见、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精神根基、健康人格，以及某些方向和领域的基础性的思维能力和听说读写能力都可以从其他课程和生活（主要是其他课程）中学到和养成。但如果学生没有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那就会严重影响他们学好其他课程，进而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直至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开设一门课程来专门教

学生熟练掌握祖国的语词文字。至于这门课程究竟是叫国语、国文、汉语、语文，还是别的什么名称，是不很重要的。

由于除了字典辞书之外，语词文字总是散嵌于话语文章之中；语词文字内化于大脑也不是像在字典辞书中那样堆积，而是类似在百科全书中散嵌。因此要熟练掌握杂多的语词文字，就必须让学生听说读写杂多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那么，通过听说读写杂多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来学习掌握语词文字的同时，自然就要潜移默化地受到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的浸润、熏陶、感染和启迪，或者说要不知不觉地积淀到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离散、粗疏、模糊、隐约的思想文化知识。这就是说，通过听说读写话语文章来学习掌握语词文字的同时，必然要获得一些“副产品”。

既然散嵌于思想文化知识中的语词文字和思想文化知识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事物，那么从思想文化知识中学习语词文字和从思想文化知识中学习思想文化知识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过程和学习规律，进而就会有不同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这就是语词文字和思想文化知识必须分科教学才能获得最大效率的客观原因。

由此可见，对语文课程基本特点的科学概括应该是：教育学生通过听说读写话语文章以熟练掌握祖国常用的语词文字，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二

新课标由于把语文混同于人类文化，因此凡是人类文化中具有的东西和学习交流人类文化必须具备的素养能力都成为“语文素养”了。《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宣称：“语文素养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这何止是“语文素养”，分明是一个“万能博士”的素养。有了这样的“语文素养”，还用得着去学其他课程，去考研读博吗？这种无所不能、无处不会的“语文素养”恐怕只有上帝才会有，凡人是没有谁会有的。

笔者认为，世上无人能熟练地听说读写不限方向和领域的用本民族语言形成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即使是听说读写一定方向和领域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也不是单靠语文素养，而是还要靠从其他课程中学习和形成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语

文素养只是听说读写话语文章时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素养或者说能力。它在听读行为中是听读话语文章表层意义的的能力，即初通话意文意的能力；在说写行为中是把心内的形式不规范的只有自明的思想文化知识外化为规范的别人能顺利明白或欣然接受的话语文章的能力。当然，语文素养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亦即某种方向和领域的思维能力）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它们的区别，就像植物中的纤维和植物密不可分，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它们的区别一样。确认语文素养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区别，并不意味着语文素养中只有一堆杂乱的语词文字，根本没有一点思想文化知识。因为如前所述，语文是散嵌于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中的语词文字，而不是脱离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孤立存在的语词文字，所以在为熟练掌握语词文字而听说读写话语文章的过程中会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积淀到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事实上一个人熟练掌握的语词文字即语文素养越是丰富，他的语文素养中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思想文化知识就越是杂多。但语文素养中这种由语词文字潜携暗系的杂多的思想文化知识，只是

心理词汇赖以存在的离散、粗疏、模糊、隐约、暗昧而难以集中唤醒的里衬、背景或者说凭借，它不足以形成能熟练听说读写某一科类所有话语文章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或者说文化底蕴，更不足以形成能熟练听说读写天下所有话语文章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或者说文化底蕴。谁也说不清自己从语文学习中掌握了哪些科类的系统的思想文化知识，更说不清自己的心理词汇嵌藏在哪些科类的系统的思想文化知识之中。由此可见，语文素养中的思想文化知识同其他学科培养的系统、明确而容易集中唤醒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要能熟练听说读写一定方向和领域的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不只需要语文素养，而且还要有从其他课程中学到和养成的思想文化知识素养。这就是说，听说读写能力中不仅有语文素养，而且还有思想文化知识素养；对前者的培养是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后者的培养是思想文化知识课程的教学目标。新课标由于混淆了语文同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区别，进而混淆了语文素养同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区别，把既有语文素养又有思想文化知识素养的听说读写能

力等同于语文素养，因此它无法科学地阐明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

。

三

新课标由于把语文素养混同于思想文化知识素养，因此课程目标就成了一种无所不包、博大精深、无边无底、虚无缥缈的目标：既有道德品质、情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又有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既要吸取民族文化智慧，又要吸收人类文化营养；既要发展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潜能，又要养成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既要有独立阅读能力，包括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又要有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这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不限方向和范围的，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方向和范围的。

这哪里只是语文课程目标，分明是“万能博士”课程目标。不用说，这样的课程目标也只有上帝才能达到，凡人是没有谁能达到的。

笔者认为，语文课程的总体目标，就是教育学生从听说读写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过程中熟练掌握祖国的词语文字。这个目标并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即便是 3500 个常用字，要使初中毕业生都能熟练地达到“三会”（会认、会写、会用），就不是很容易的。更何况汉语的主体不是文字，而是语词。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掌握的英语词汇量大约是 6000 个，那么，对母语词汇的掌握至少应是它的 3 倍吧，那就是 18000 个（指 3500 个常用字的基本意义以外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语词）。一个语词要经过几次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解、识记和使用才能熟练掌握，至今没有以后恐怕也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但我想至少恐怕要 3 次以上吧。所谓熟练掌握，包括牢固识记和熟练运用两个方面。汉字有一部分可以有效地集中识记，但不能集中使用，而词语则既不能有效地集中识记，也不能集中使用。因此，这么多的语词文字要通过听说读写散嵌着它们的话语文章来达到熟练地掌握，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对语词文字的掌握，可分为口头掌握和书面掌握两种方式和要求。口头掌握常用的语词文字，那是文盲都能达到的，但要书

面掌握常用的语词文字，则非进学校学习不可。在书面上掌握了语词文字没有不会在口头上运用的。书面母语存在的历史远比口头母语存在的历史短暂得多，但它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速度是口头母语无法比拟的。从学生学习其他功课和今后发展的需要来说，掌握书面母语无疑比掌握口头母语更重要，更急需。而学生在课内外学习书面母语的时间和机会并不会多于对口头母语的学习。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世界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获得不限方向和范围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学生在某些方向和领域的基础性的听说读写能力是多门课程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语文课程能单独完成的目标，在语文课程中致力于教育学生从听说读写各种话语文章中熟练掌握祖国的书面语词文字，只会迅速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那么我们就必须理直气壮地确认：语文课程的总体目标，就是教育学生从听说读写话语文章即思想文化知识的过程中熟练掌握祖国的书面词语文字。

我不知道新课标为什么在阶段目标中规定小学 1——2 年级只识记 1600——1800 字，而不是 2000 字左右。几十年的识字教学实验早已充分证明，集中识字教学中的“字族文”识字教学法和

韵语识字教学法，能够使入学儿童在两年时间里轻松地识记 2000 多字。这对学生迅速提高思想文化知识素养、发展听说读写能力是多么有好处。新课标为什么不能吸收集中识字教学的优秀成果呢？

四

新课标由于把语文课程目标扩大成无所不包、博大精深的“万能博士”课程目标，因此它无法科学地阐明语文课程的教材特点，教学规律，教学方法及其同教材内容的关系，以及编写教材的正确的选文标准。

笔者认为，语文教材的特点有二：

(1) 它只能是文选型的，而不能是系统有序的知识型的；

(2) 它不是学生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学问，而只是学生积累和学会熟练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凭借。这就是语文教材同许多非语文教材或者说思想文化知识课程的教材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自然是由两种课程不同的本质特点和不同的课程目标决定的。思想文化知识课程是教育学生从教材中掌握某种思想文化知识以培养发展某种思维能力的课程。因此其教材内容是单一、递进、

系统、完整的思想文化知识或者说著作体系，是学生今后发展必需的某种基础学问。语文课程则是教育学生从教材中熟练掌握祖国杂多的语词文字以培养发展书面母语能力的课程。因此其教材内容只能是杂多离散的思想文化知识——杂多离散的选文汇编。因为只有杂多的选文才能散嵌着杂多的语词文字，同时为学生积累和学会运用杂多的语词文字提供杂多的言语环境。语文课程从综合性的传统教育中独立出来以后，其教材内容历经上百年而始终不能形成有序递进的内在逻辑体系，其原因就在于此。不言而喻，从不同的选文中能学到相同的母语，任何一套语文教材的课文全部换用别的选文同样能教会学生熟练掌握书面母语。因此，语文教材内容不是学生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学问，而只是学生积累和学会熟练运用语词文字的凭借。

既然如此，那么选什么样的文章编入语文教材就必须符合学生从选文中迅速高效地掌握祖国书面语词文字的规律和教学方法。这就是说，在语文课程中，不是教学方法要适应教材内容，像思想文化知识课程那样，而是相反，教材内容要适应由语文教学规律决定的教学方法。

教学规律总是对某种教学对象进行教学的规律。如前所述，思想文化知识课程是教育学生从单一、递进、系统、完整的教材内容即著作体系中全面、准确、透彻地掌握某种思想文化知识以培养发展某种思维能力的课程，因此其教学规律是“得意忘言”、举一反三。其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读和做题，因为教师的导读讲析比学生自行探求把握教材的内容意义更为准确、全面、快捷、省时，而做题则是巩固和运用教材的要点和结论的有效方法。

但语文课程是教育学生从杂多离散的选文中掌握祖国杂多的书面语词文字以培养发展书面母语能力的课程，因此其教学规律只能是学生“自求得之”、“举一反三”。通俗地说，就是“多读多写”。虽然过去不断地有人提出过语文教学必须多读多写，但我们始终没有把它作为语文教学的规律来认识，也没有在语文教学中普遍地运用，那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弄清楚语文课程究竟必须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因而不知道这个多读多写的“读”和“写”到底必须是怎样的读和写。笔者认为，这个“多读多写”的“读”和“写”，不是几十年流行至今的详尽理解分析选文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讲读”和与阅读分离而缺乏写作素材的要学生胡编乱造的“作文”，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17020045036006200>